



\* [中国现代诗学]

主持人:吕进

**主持人语:**汉语新诗越来越成为覆盖我们星球的诗歌现象;写作和研究汉语新诗的,既有中国两岸四地的诗人和学者,也有侨居海外的华人诗人和学者,同样,还有外国诗人和学者。就写作汉语新诗而言,不说侨居在外国的华人诗人(数量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单说外国人中的汉语诗人,目下就已经有了一个可观的队列。随意地举出一些姓名吧:马来西亚有吴岸、贺兰宁、苏清强、适民、杰伦、王涛、晨露、孟沙、彼岸和方昂,新加坡有秦林、方然、周槃、陈剑、长瑶、简笛、希尼尔、南子、史英、沈璧浩和曦林,这两个以华族为主的国家被称作今日地球村的汉语新诗重镇。菲律宾的云鹤、月曲了、明澈,印度尼西亚的顾长福、旭阳,越南的林小东,韩国的许世旭,文莱的海庭,法国的黄玉顺,以及泰国的曾心,他们可都是土生土长的外国诗人。而且这是一份随意性很强的很不完备的名单。在汉语新诗的研究中,韩国的许世旭教授和朴宰雨教授、日本的秋吉久纪夫教授和岩佐昌璋教授、泰国的曾心先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对于汉语新诗的外国群落,我们应该加以注视和研究。本期我们推出的熊辉博士研究许世旭的论文,就是想在这方面来一个启动。同时,许世旭教授刚刚去世,我们刊出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诗论家孙玉石先生的文章,这也是我们对这位我们敬重的老朋友的悼念吧!《葡萄园》是台湾已经创刊近半个世纪的重要诗刊,它的诗学主张具有强大影响,本期我们推出有关论文,请读者一读。

## 许世旭的汉语诗学研究

熊辉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市 400715)

**摘要:**许世旭先生是当代韩国最负盛名的汉语诗人和汉学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是海外汉语新诗研究的典范。许世旭先生的汉语诗学研究,主要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长期的阅读体验,也来源于他长时间地体验并融入汉语文化生活。许世旭先生构建了成熟的汉语诗学方法论体系,能够跳出中国大陆或台湾学者研究新诗时“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当局者迷”的局面,具有丰富的诗学内容。但同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在具备中国诗歌审美属性的同时,也涌动着半岛文化和高丽民族的文化性格,隐现出挥之不去的民族情愫。

**关键词:**许世旭;汉语诗学;获得语写作;民族性;汉文化;韩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2-0024-06

许世旭(1934-2010),韩国任实人,1960年赴台留学8年,先后获得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研究所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1968年学成回国后,历任韩国外国语大学及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曾担任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韩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客座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许世旭是当代韩国最负盛名的汉语诗人和汉学家,1961年起用中文写诗,出版了汉语诗集《雪花赋》、《东方之恋》以及《一盏灯》,是迄今为止少有的被中国文学界承认的外籍汉语诗人。他也在致力于研究中国诗歌及中国文学史的近50年时间里,出版了《中国现代诗研究》、《新诗论》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多部专著,逐渐积淀起了丰富的汉语诗学思想。

### 一、许世旭汉语诗学的来源

作为一个获得语写作者和韩国汉学专家,许世旭的汉语诗学思想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阅

\* 收稿日期:2010-12-06

**作者简介:**熊辉(1976-),男,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现代诗学。

读经验,也与他长时间地体验并融入汉语文化生活密不可分。

许世旭汉语诗歌研究的造诣首先基于他对中国文学的广泛阅读。许先生对中国文学的接触始于赴台留学之前,他在一次笔录采访中谈到了早年阅读中国文学与古典诗词的情景:“我还没有认识中国以前,先吸收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的营养。当我初中三年级,第一次读到《北京印象》之一篇散文,开始向往中国。韩战爆发那一年,我正是高中一年级,先父命我不要出门,叫我别管内外风云,请一位家塾之老师教我中国的文言与诗词,先从千字文起习字,再从唐诗三百首起念诗。结果会背几百首诗词,并酷喜她的节奏与意境。当时虽然年轻,而能把握住中国诗词里所含蓄的高度的艺术性,例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等之余韵美。还有她的信仰感,就是诗悟如禅悟的境界。”<sup>[1]208</sup>许先生一直喜欢“豪放飘逸”的带有“塞地风味”的古典诗歌作品,至于乐府诗、绝句和现代新诗则直接影响了他的汉语新诗创作。年幼时对中国地理层面的向往与诗歌艺术层面的体认,让许世旭坚定了选择汉语文学的道路,以至于他后来在中国现代诗的研究中,也非常注重从古典诗歌艺术比如“言外之意”和“意境”等角度去研读新诗。

更为重要的是,许先生的汉语诗学来源于他融入了中国文化语境和现代诗创作语境中的一种诗学精神,并以切身体验强化了他汉语诗学思想的深度和纯度。有资料显示,许先生20世纪60年代初到台湾后,很快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生活环境,“唐人之脸”、“半个中国人”或者“汉化之棒子”,就是对他汉文化身份的形象而生动的写照,他与台湾诗坛上很多活跃的诗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有人回忆说:“大家都忘了他的真正血统,感觉上,他就是一个中国人,不论诗或散文,他的气质早已道道地地的‘汉化’,他的脸型是唐人之脸、宋人之脸、明人之脸,喝酒划拳时有一张中国农人、士兵的拙朴之脸,谈文论艺时则有一副中国文士泱泱气度之脸。他的生活习性,跟我们在军营同营的大伙简直可说‘一鼻孔出气’,……他也就在这样的心理、环境背景下进行他的中文创作。”<sup>[2]</sup>关于这一点,许先生在接受别人采访时说:“我是在韩国土生土长,甚至我的家谱上也找不出一行与中国的血缘,但我承认我是相当中国的情怀。尤其是我的嗜好、我的追求、我的价值、我的情绪,不外乎中国小摊上摆的猪耳朵、一杯白酒、一群古道热肠的朋友、一张小桥流水的水墨。还有,还有文化的细胞,……反正我们在一起我也常忘了我的真正血统。”<sup>[1]209</sup>许先生忘记的“血统”是文化血统,他已完全融入了汉文化中,消除了一个外国人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时难以克服的文化障碍。人们使用外语进行文学创作时,总会面临来自语法、词汇和表达之外的种种困难,半岛文化和大陆文化以及语言的差异,就许世旭先生的汉语诗创作和研究而言,无疑具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从他的作品如《追随东方》中,却可以感受到“不仅汉语是他的母语,似乎,那古老中国的斑驳历史也已点点滴滴流入了他的血脉之中”<sup>[3]</sup>。许世旭在台湾留学所获得的,不仅是汉语环境的熏陶,更是汉文化的浸染,他的汉语诗学由此获得了一般获得语写作者难以企及的高度,他对汉语诗歌的领悟和对汉语诗歌历史与创作现实的熟悉程度也随之提高,这成为许先生日后汉语诗学体系的“先验”基础和语料来源。

许世旭先生丰厚的汉语文化素养以及他在留学时期的汉文化生活体验,为他从事汉语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使他克服了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时普遍面临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从而游刃有余地在汉语新诗的王国中驰骋。

## 二、许世旭汉语诗学的研究方法及内容

作为一个韩国学者,许世旭常常能够跳出中国大陆或台湾学者研究新诗时“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当局者迷”局面,他的汉语诗歌研究因此在方法上和内容上显得更为宏观和全面。

许世旭惯用两岸横向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新诗,拓展了汉语诗学的研究内容。许先生善于通过两岸文学的对比研究,去寻找汉语诗歌的发展轨迹,相对于将彼此纳入边缘地位的中国台湾或大陆学者而言,其汉语诗学的观照视角无疑更为宏大,内容也更加丰富。许先生以历史和政治为切入点,认为中国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在客观上必然会产生差异:“二十世纪,对中国人而说是动荡的世纪,世纪初由甲午战役,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却给日本统治五十年,中日战争结束,台湾光复,即由国民政府接治,但四年后因国民政府撤退台湾,大陆两百多万人随其政府远走台湾,痛失家园。从此(1949)新中国与国

民政府,造成两岸,加重创伤,这历史的转折,造出两条不同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的道路。”<sup>[4]</sup>既然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和国民政府统治下,与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存在着很大差异,那由此产生的文学在价值取向上也会大相径庭。许先生1992年在《中国现代诗研究》的第二章第一节中,历时性地比较研究了两岸现代诗的差异,同时指出,二者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同质化趋向”<sup>[5]</sup><sup>270</sup>,这本书可以视为他采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大陆和台湾新诗的奠基之作,他以后的汉语新诗研究,也多由此生发而来。比如,许先生1998年在《两岸新诗的发展比较》一文中,以10年为限分4个阶段纵向比较了大陆和台湾诗歌的差异<sup>[6]</sup>。2002年,在参考了大陆和台湾当代文学分期之后,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两岸文学研究之发展与展望》一文中认为,两岸文学其实存在着相似的发展周期,即“政治文学期(1949-1966)”、“更生期(1966-1986)”和“回归整合期(1986-2001)”<sup>[4]</sup><sup>5-8</sup>。这些论述显示出许先生研究汉语新诗时,采用了基于两岸诗歌现实的比较立场。从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事例出发,他注意到了两岸文学发展过程中各不相同的兴奋点和时代特色,并指出各自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韩国有名的汉学家,许世旭在对两岸诗歌进行比较研究时,始终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没有因为对台湾的偏爱而卷入两岸诗学观念的对峙之中,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事汉语诗歌研究。例如,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陆当代诗歌与台湾诗歌的差异时,许先生并没有一味地因为大陆诗歌政治意识浓厚而断然加以否定,反而对其艺术性给予了较高评价:“大陆的诗,尽管多带政治性,但也有好处,如:滚滚的节奏、慷慨的情怀、辽阔的时空等。”<sup>[1]</sup><sup>211</sup>总之,从两岸诗歌语境和创作的差异出发去研究现代汉语新诗,是许世旭先生一贯坚持的学术方法,相对于仅研究大陆诗歌或台湾诗歌的诗学观念而言,他的汉语诗学在同时考量两岸诗歌的基础上,具备了更为广泛的普适性。

许世旭对中国新诗的研究具有整体性眼光,反映出他架构整体性汉语文学的诗学理想。许先生高屋建瓴的比较研究,较符合两岸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但他比较两岸诗歌的目的,并非是要找出二者的差异,或最终作出孰优孰劣的评判,而是站在汉语文学的基础上将二者视为“同文同种”的整体,力图通过发现二者的异同来重构汉语诗歌的新秩序。许先生对汉语文学发展的整体性进行了如下展望:“时运交移,文学总要归于母体,而且仍然循着‘分久必合’之历史规律,再加上正在寻根的情怀与跨越国与国、族与族之全球意识。这是千禧年来两岸学界,势必回归整合的重要原因。”<sup>[4]</sup><sup>9</sup>在实际研究中,许先生也从具体的诗歌创作中,看到了台湾诗歌与大陆诗歌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台湾五〇年代早期的政治诗是完完全全自大陆带来的,而且是沿用抗战时期开始的那种激情化的、散文化的诗歌,那种诗歌多半适于朗诵的,……而五〇年代早期的诗刊与文艺刊物上所见的新诗,大部分是抒情诗,而十行之内的短诗,少则三分之一,多则占一半,这类或抒情或思维的短诗也是二、三〇年代曾由谢冰心、宗白华、汪静之等在大陆风行过的短诗派与新月派的延伸。”<sup>[7]</sup>这里表明,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诗歌带有当年大陆诗歌的印记,我们不能因为二者在地理和政治上的距离而人为地加以肢解。许先生还梳理出两岸当代诗坛的五点“共相”:一是“均受政治的干扰与影响”;二是“诗坛上现着正、反、合的历史趋势”;三是“两岸诗,仍然摆不脱中国传统儒家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感”;四是“民族情怀与本土情结”;五是“同样有新诗潮的新年代”。这些相似点让许先生坚信“中国诗统一整合的路子,不久会展现”<sup>[8]</sup>,哪里还能去区分两岸诗歌的优劣并圈定各自的“地盘”呢?

也正因为怀揣着建构汉语整体文学的理想,许先生对目前中国两岸四地的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将台湾、香港、澳门甚至少数民族文学与大陆文学剥离开来的做法感到忧心:“大陆的几部当代文学史,独立台湾、香港、澳门与少数民族的当代文学史,且台湾的几部当代文学史中,同样分开大陆与台湾而写的,这种写法是空前的。正当中国文学回归整合的大时代,大环境中,却见得各自独立的部分现象,是值得注意。……而这种趋向与大陆目前进行地区文学史的著作,如:《湖南文学史》、《福建文学发展史》、《岭南文学史》等稍有区别。”<sup>[4]</sup><sup>10</sup>他自己在研究中国新诗历史的时候,总是将台湾和大陆的诗人诗派融为一体,不像某些中国大陆学者或台湾学者那样人为地将两岸诗歌割裂开来。比如许先生的汉语新诗史研究以诗派为链条,在摆脱传统编年史书写模式的同时,凸显出每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品和诗论主张,他将“创世纪诗派”置于包含大陆和台湾在内的整体性的中国新诗发展历史中<sup>[5]</sup><sup>137-159</sup>,与之前的“九

叶诗派”和后起的“今天诗派”置于相同的等级；他的“诗人各论”<sup>[5]409-461</sup>也将台湾诗人钟鼎文、周梦蝶等纳入到与之前的艾青和之后的北岛同级的研究中，明显打破了人为划分的两岸诗歌研究的疆界，这些都是许先生对他自己的汉语整体文学思想的实践。许先生的汉语诗学思想之所以具有两岸的比较视野和整体性眼光，与他早年留学台湾的经历和体验密切相关，他亲历了台湾 20 世纪 60、70 年代文学发展的巨大变化，甚至可以说对台湾文学的认同程度远远超过了大陆；但随着中韩建交之后他对中国大陆文学的接触和了解，他发现大陆的现代文学同样丰富，且具有台湾同期文学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应该说，对大陆文学的认同以及对台湾文学的情感，导致许世旭先生的汉语诗学研究必然会戴上两岸比较的“透视镜”，并希望二者有朝一日能完全整合。换个角度来讲，即便许先生没有台湾留学背景，作为研究汉语诗歌的学者，也应该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也应该将两岸四地乃至整个华文诗歌纳入观照的范围，惟其如此，才能在整体观照的基础上抽象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最佳理论模型。

许世旭先生经常采用古今纵向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新诗，坚持认为新诗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承传，深化了汉语诗学的研究内容。中国新诗在五四时期取代旧体诗成为文坛主流，很多学者如梁实秋等根据当时的西化思潮和翻译潮流认为，中国新诗文体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来影响；也有学者如周作人等从民族诗学立场出发，认为中国新诗的诞生源于自身内部的规律性演变。事实上，在逐渐开放和发展的文化语境中，中国诗歌文体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来影响，但却不能据此认为外来影响是新诗发展的主要助推力，“文变染乎世情”，时代风气的更迭也会带来诗歌创作的变化。作为一位海外汉学家，许世旭对中国新诗的研究并没有跟风似地站在“传统”或“西化”后面，而是从新诗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他认为：“中国新诗的生长，靠三分自己的历史进化，靠四分外来的影响，再靠三分自己的革命与运动，才能带到今天的广场。就是说并不完全出乎其外，成乎其内的。”<sup>[9]</sup>不管外来影响占据多少比重，中国新诗在发展进化过程中已然受到了外国诗歌影响的事实无可更改，但新诗在发展近一个世纪之后逐渐积淀起了自己的艺术和精神传统，诗人的创作在汲取现代营养的同时，也应该将艺术修养延伸到古代诗学领域，唯有如此才可能达到许先生所倡导的“中国诗人，必须中国”的纯汉语诗创作境界。许先生关于新诗与传统诗歌的认识，与中国大陆学者吕进先生的看法有相通之处<sup>①</sup>，即中国新诗的发展应该“坚定地继承本民族的优秀诗歌传统，但主张传统的现代转换；大胆地借鉴西方的艺术经验，但主张西方艺术经验的本土化转换”<sup>[10]</sup>。这是在开放的语境中发展汉语诗歌的合理道路，而要做到汉语诗学思想的中国化，新诗应该从纵向的维度继承传统诗歌的合理要素。许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新诗在发展历程中哪怕是在形成期，都没有割断与汉语诗歌传统的血缘关系。他从四个方面论证了中国新诗对古诗的“纵承”：首先是主题，“古代诗歌之频出主题有如：惜时、相思、怀古、悲秋、思乡、黍离、生死、仕隐、山水、性理、讥讽等十几种，如果用这种标准看新诗的话，今天新诗的三分之二，都不会超出上列的主题范围”；其次是风格，“中国旧诗之风格与境界，应以豪放、含蓄、飘逸等作为代表，……今天新诗的风格，仍是豪放、含蓄、飘逸等性格”；第三是形式，“中国的旧诗发展有两条路，一则入乐，另一则不入乐，一则齐言诗，另一则参差长短诗。……实在就与今天的新诗同质的”；第四是语言，“新旧诗之语言，虽然有严谨与放松、具体与概念、意象与抽象之别，但互有交替现象，如旧诗有散文化，新诗有复古化的现象”<sup>[11]</sup>。既然新诗与旧诗之间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纵向承递关系，那么，今天的汉语诗人就应该“借正统化、复古化的方法来提升新诗艺术”，提升新诗的民族化品格。

许世旭先生有时也采用中韩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新诗，获得了中国学者可能无法具备的“旁观”视角和冷静客观的他文化立场。许世旭先生能够在两岸四地的中国现代诗学界享有盛誉，实在

---

<sup>①</sup> 许世旭先生是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客座教授，他之所以能和吕进先生成为好朋友，实乃二人对待传统和外来影响的观点具有相似性，二者在很多诗学问题上“英雄所见略同”。因此，除了台湾曾被许先生称为第二故乡之外，中国新诗研究所被他称为在大陆的“第二故乡”（吕进：《耳畔频闻故友去——哭韩国学者许世旭先生》，《中外诗歌研究》，2010年3期），从1991年到2006年期间，他曾多次到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授课、讲学、参加学术交流，和吕进先生讨论中国现代诗学。正是由于汉语诗学观念的接近，许世旭先生一直和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与他汉语文化和语言的超凡习得能力分不开,惟其如此,也才能消除异质文化的阻隔而直接面对研究对象,在汉语符号系统内并非隔靴搔痒地从事汉语文学研究,进而凭借自己的认知方式去完善汉语诗学体系。在行动和气质上具有中国内质的许世旭先生,在从事汉语诗歌研究时没有一般外国人那种挥之不去的文化冲突,故而他的汉语诗学是贴近中国诗歌现实的。然而,对于长期浸染在中国文化氛围内并深受其影响的学者而言,在研究汉语诗歌时要保持主观上对汉诗的热爱而选择中立是困难的,不过能做到这一点,倒可以证明其汉语诗学思想的纯正与客观。虽然早年留学台湾,受中国文学影响长达8年之久,但许先生在审视和研究中国文学时始终没有失去“第三者”的他文化立场,他的诗学思想相对于台湾和大陆的学者而言更加冷静、客观和非功利化。许先生本人曾坦诚地说,他在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两岸文学研究之发展与展望》一文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他研究中国文学的整体历程中,“始终没有放弃‘望楼’中国文学的角色来观察中国文学,相当亲切,相当客观,因而敢把笔写起此文,以供两岸学界”<sup>[4]3</sup>。许世旭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他文化立场,在他对中韩早期新诗的比较研究中也能见一斑,他以异质的韩国新诗作为参照来研究中国新诗发生期的创作现状,阐明早期中国新诗创作的丰富性及其成因。韩国与中国新诗诞生的时间和语境的相似性,决定了二者具有可比性,许先生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中用表格的形式列举了韩国1908年至1925年的“主要诗人”、“主要作品”、“主要诗集”和“主要文艺杂志”,对应于中国1917年至1925年的诗歌创作情况<sup>[5]286-287</sup>,读者通过表格列举的详细内容,就能一目了然地理解中韩早期“诗人与诗刊”的差异。没有韩国诗歌作为参照,要通过中国新诗自身的情况来论述其早期创作的丰富抑或凋敝,均难自圆其说,有时候也无法作出客观的定位。

横向的两岸对比、纵向的古今参照、中韩跨文化比较以及汉语诗学的整体观,这三者不仅构成了许世旭先生汉语诗学的方法论体系,而且也建构起了清晰的汉语诗学框架,体现出了他的汉语诗学思想的普适性、开阔性和丰富性特征。

### 三、许世旭汉语诗学的民族色彩

作为一个韩国汉学家,许世旭的汉语诗学在具备中国诗歌审美属性的同时,也涌动着半岛文化和高丽民族的性格,隐现出挥之不去的民族情愫。

许世旭汉语诗歌研究的兴奋点,反映出他汉语诗学思想中饱含着的深沉的民族情感。许先生留学台湾期间与痲弦、纪弦、郑愁予、洛夫等诗人交往密切,主要是基于相似的家国处境和民族情怀,楚戈回忆说:“‘破国意识’才是我们灵魂契合的共同根苗,有些夜晚,当我们为家国哭泣时,老许也不能自己,我们同是廿世纪人类愚昧悲剧下的祭品。”<sup>[12]</sup>许先生的汉语诗歌研究受到了这股民族情怀的影响,他对20世纪60年代台湾诗坛中军人的乡愁诗“情有独钟”,因为“他们的诗笔中深埋着时代、政治、乡愁与人生,以近乎报复的手法而咯出他们的鲜血”<sup>[13]31</sup>。他在《失乡民的悲哀》一文中,列举了当时台湾诗坛极负盛名的痲弦、商禽、洛夫、郑愁予等人的作品,来阐明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带来的国土分裂以及诗人由此体味到的愁绪,而且许先生在论述的时候一再强调:“这种孤独绝不是亚洲或中国的”<sup>[13]30</sup>,“他们也深藏着亚洲的苦闷和知性,深藏着一股茁长与奋斗的力量”<sup>[13]37</sup>。朝鲜半岛和中国当时的历史处境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许先生看来,台湾诗坛的这股乡愁或孤独的情感,并非来自大陆的“阿兵哥”独有。作为一个异乡人,他同样如痲弦的《深渊》那样“懒于知道,我们是谁”;作为一个在韩战中经历了祖国破碎和民族分裂的人,他同样如洛夫的《石室的死亡》那样感叹“神啊!我所能奉献给你脚下的只有这愤怒”。台湾的很多诗歌让许世旭感同身受,他对这些诗歌的偏爱和研究,折射出了他的汉语诗学所承载着的浓浓的民族情怀。

许世旭对汉语诗歌语言的突出强调,同样折射出他潜意识中隐藏着的民族情结。特殊的语言运思和组合方式决定了诗歌艺术的隶属度,任何诗学研究都不可能绕开语言而独论情思,许先生的诗学思想自然也包含了丰富的诗歌语言观念。根据译介学的观点,许先生用汉语翻译的韩国诗“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sup>[14]</sup>,与之相关的言论也理应属于汉语诗学的范畴。他在用中文出版的译诗集《乡愁》的译序中,打量20世纪上半叶韩语诗歌历史,他认为:“就只有两位能代表”韩语诗

歌半个世纪的发展成就：“一位是以民歌的语言活跃于北部的金素月(1902-1934)，另一位就是以现代感性的语言活跃于南部的郑芝溶(1902-1950?)。”<sup>[15]</sup>许先生从语言的角度出发，不仅厘清了韩语诗歌发展的两种路向，即“民歌的语言”和“现代感性的语言”，而且也彰显出他本人对更富于艺术元素的现代诗歌语言的偏爱。需要指出的是，许世旭诗学对语言的强调，除了基于艺术审美立场之外，也与20世纪前半期朝鲜半岛的殖民化际遇不可分割。在日据时代，诗人的创作在情思上主要集中体现为超越殖民统治之苦，比如：“青鹿集(即青鹿派——引者)的朴斗镇(1916-)、朴木月(1919-1978)和赵之薰(1920-1968)写作描写自然的诗，意在超脱于日本压迫的残酷现实之外。”<sup>[16]</sup>在语言上则“不便以母语写诗”，或者母语创作处于“潜在写作”状态，在公开场合只能使用日语，加上西化思潮的影响，韩语的纯洁性和生存的合法性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许世旭从诗学的角度对“母语的纯正”的强调，体现了十分强烈的民族色彩。

总之，许世旭先生成就斐然的汉语诗学研究，堪称海外汉学研究的典范。但作为一个海外汉学家，其汉语诗学思想在具备他文化立场、比较方法和整体性眼光等多维视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与本土学者的研究拉开距离，甚至渗透出明显的民族情结。许先生新鲜而独具特色的汉语诗学思想是中国现代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收获，是比较诗学和跨语际交流的必要内容，理应受到全球华文诗学界的广泛关注。

#### 参考文献：

- [1] 王伟明. 从雪岳到长江——许世旭笔访录[M]//诗人诗事. 香港:诗双月刊出版社,1999.
- [2] 痲弦. 唐人之旅——许世旭散文印象[M]//许世旭. 城主与草叶. 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4.
- [3] 蒋勋. 序许世旭先生诗集[M]//许世旭. 雪花赋.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1-2.
- [4] 许世旭. 五十年来中国两岸文学研究之发展与展望[C]//韩国中语中文学会. 两岸中国语文学五十年研究之成就与方向(韩国中语中文学第1回国际学术发表会发表论文集). 韩国中语中文学会,2002.
- [5] 许世旭. 中国现代诗研究[M]. 韩国首尔:明文堂出版社,1992.
- [6] 许世旭. 两岸新诗的发展比较[M]//新诗论.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161-183.
- [7] 许世旭. 延伸与反拨——重估台湾五〇年代的新诗[M]//新诗论.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20-21.
- [8] 许世旭. 从两岸当代诗,比较中国传统文化[M]//新诗论.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200-205.
- [9] 许世旭. 中国诗人,必须中国[M]//新诗论.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3.
- [10] 吕进. 中国新诗研究:历史与现状[J]. 理论与创作,1995(4):9-13.
- [11] 许世旭. 中国历代白话诗与新诗之纵承关系[M]//新诗论.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8.
- [12] 痲弦. 转动着的故乡——许世旭的双语世界[M]//许世旭. 许世旭自选集.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254-255.
- [13] 许世旭. 失乡民的悲哀——记六〇年代台湾诗的一股流[M]//新诗论.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
- [14]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239.
- [15] 许世旭. 译者序[M]//乡愁.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
- [16] 韩国手册(中文版)[Z]. 首尔:韩国海外公报馆,1992:182.

责任编辑 韩云波